

史继忠
张祥光
编

李 独 清

学 术 文 选

LIDUQINGXUESHUWENXUAN

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·贵州省文史研究馆

李独清先生，黔中宿儒，一代名师，并是有名的诗家、藏书家和文献学家。先生对于诗及诗学有很深邃的造诣，一生诗作数千首，于一九八二年自订为《洁园剩稿选》行世。先生所为文，序跋之类附见于他所校辑编纂的各书，专论文章已发表的散见于各报刊杂志，至于未刊稿，则于十年动乱中与所藏书籍文物一样，多数佚失了。这是十分可惜的事。为了使现存稿件不致再行散佚，并便于学者参考，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倡议选辑印行，商之于我馆同志，我们认为这是大好事，非常赞成。

先生文稿存在的，有的是序跋，有的是关于乡邦文献、事迹、人物的考证或论述，关于中国文学史中几位诗词作者生平中聚讼问题的论证，以及怀人纪游之作等等。虽然都是论文和纪述文字，但一片爱国爱乡之情，渝于言表。

集中《续修贵州通志和征集文献经过》一文，给我们留下我省文史工作中这些史事经过始末的记录。民国《贵州通志》的编纂是我省史志史上的一件大事，贵州文献征集馆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，单是编印了六集《黔南丛书》和一集《别集》，存亡继绝，功不可没。由于当事人多已去世，要不是李先生留下此文，这些史迹都要湮没了。文章虽是专述，但也从中反映出当时贵州政局的变迁和社会的一些情况，以及我

省耆旧关心乡帮文献的至切心情，孜孜于搜集整理印行的努力，克服困难，终抵于成。这种精神，对后来从事文献工作的人们，应该有所得到启发。本书就编辑了李先生为《民国《贵州通志》所撰写的《秩祀志序》、《艺文志序》，《金石志序》等文。

关于黔中名胜甲秀楼，先生一动笔就写了四篇，先成《甲秀楼》一文，继之写成《甲秀楼修建考》和《续考》，考订此楼修于明万历二十五年，指出《康熙通志》和《黔南识略》诸书作为万历十五年的错误。并且根据史实及其他记载考订，以为《康熙通志》所记朱燮元曾经重修过并改名为来凤阁，也是显然不符事实，是未可置信的。在《关于甲秀楼长联》一文中，以曾见刘蕴良手稿录有此联，肯定是刘蕴良所作，而不是如向知方先生《贵山联语》以为刘春霖作。并根据所见手稿，改订了通传此联的几个字，加以分析，认为手稿较传稿为优。正如李先生所说，他的这些稿件，考订了甲秀楼的有关史实，可供编纂《文物志》的参考。当然也可以作为编写导游指南等类的书册的参考依据，以避免不实的介绍。

李白以曾从永王璘被放逐夜郎，他是到了流放地还是半路被赦回，历来其说不一，是历史上一个悬案。独清先生搜集列举李白有关长流前后的诗歌，加以厘正考订，撰为长文，推论李白实至夜郎。是执之有故，言之成理的，令人信服。这样来考证无明确证据，而有两种可能结论的疑点，使其归之为—，其方法也是可供学者借鉴的。

《巢经巢诗说》，全面地论述了郑子尹对诗歌的主张，郑诗的思想内容，创作艺术（气势、风格、境界、创作倾

向、表现手法、句法、炼词用字等)；并列举了对郑诗的重要评论。本文是李先生力作之一，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子尹诗的导读文章。

《关于晏殊〈珠玉词〉的评价问题》，以为晏殊不仅是如前人和今人所说的“太平宰相”“没有什么错折”等，而还有屡遭贬黜，劳碌奔波，随时有大祸临头的一面、《珠玉词》也不止是“淡淡的哀愁”、“寂寞衰迟之感”而已，而且有不可说出的忧愁和恐惧。并从这样的前提观点来分析晏词，实在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创见。

集中所载他文，也都是很有分量的，我就不赘说了。

读先生的文章，深深感到他的治学与行文态度十分谨严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但在记述的文章中，也偶有误记之处，如在《回忆谢六逸》文中说六逸未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，而实际上是任过的，其时间就在离大夏去师院之前。可能六逸对李先生说的一段话是在大夏负责人约请先生任院长之初，他本不愿就任时说的，后来改变了打算终于就任了。

与李独清先生同时或稍前或稍后的时间，贵州还有不少文人学者，他们的著述，其中不乏是有价值的。但我省为之搜集整理出版的并不多。我所见到的仅有姚茫父《书适》和余达父《惺雅堂诗集》等几种（《书适》印本错字特多，是一憾事）。现在又增加了《李独清学术文选》一种，是令人欣慰的。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和有心人都来关切这一工作，以使我省耆旧所作有价值的著作得以留传，以为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加添一些砖瓦，实在是应该做的事。

冯楠

（1992年6月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）

目 录

序.....	(1)
续修《贵州通志》和征集文献经过.....	(1)
秩祀志序.....	(23)
艺文志序.....	(24)
金石志序.....	(25)
五曹州乡土志序.....	(26)
陈给谏遗诗序.....	(27)
《笙鸣鼓和集》序.....	(30)
《贵州当代诗词选》序.....	(33)
《历代抒情诗选》序.....	(38)
《幽心梦影录》弁言.....	(42)
董其坝观梅记.....	(44)
甲秀楼.....	(45)
甲秀楼建修考.....	(51)
甲秀楼建修续考.....	(70)
关于甲秀楼长联.....	(78)
黔灵公园.....	(81)
李白流夜郎考.....	(86)
关于晏殊玉词的评价问题.....	(139)
李清照改嫁辨正.....	(164)
论辛弃疾词及其流派.....	(187)
明史何腾蛟传考异.....	(225)

巢经巢诗说.....	(275)
严俨传.....	(318)
回忆谢六逸.....	(321)
附：李独清自传.....	(328)

续修《贵州通志》和征集文献经过

贵州地方志的纂修，始于宋代，有《思州图经》、《黔州图经》。元大德六年有李京《乌撒志略》四卷，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载有元代《贵州宣慰司志》，书皆不传。

明代流传下来的有一四一八年（永乐十六年）沈勣撰《普安州志》十卷和一五三四年（嘉靖十三年）题田秋撰《思南府志》八卷。二书皆藏天一阁，有中国书店影印本。今存属于通志性质之书，有嘉靖中（或云宏治时纂）贵州宣慰使司儒学教授赵瓚撰、金陵沈庠删正《贵州图经新志》十七卷，一五四四年（嘉靖二十三年）贵州宣慰司训导张道撰、按察司副使谢东山删正《嘉靖贵州通志》十二卷；一六〇三年（万历三十一年）贵州巡抚郭子章撰《黔记》六十卷，均有传钞本或复印本。

清代康熙年间两次修志。一六七三年（康熙十二年）巡抚曹申吉倡修、贵阳吴中蕃主纂，成书三十三卷（《贵阳府志》称康熙前《贵州通志》），遭吴三桂之乱，板毁。一六九二年（康熙三十一年）又由巡抚卫既齐倡修、吴中蕃主纂、周起渭、刘子章、黄嘉谷等分纂成书三十六卷（《贵阳府志》称康熙后《贵州通志》），修成后两月，卫既齐即罢职而去。一六九三年（康熙三十二年）阎兴邦继任巡抚，又加增补，成书三十七卷，一六九八年（康熙三十七年）刻成。今流传《康熙志》皆阎本。一七三六年（乾隆元年）云

贵总督鄂尔泰、贵州巡抚张广泗倡议重修，延聘姚州知州靖道模主修，未竣。又由仁怀知县杜诤续纂，至一七三九年（乾隆四年）而止，全书四十六卷，为目七十有四。一七四一年（乾隆六年）刊成，即今流行本《乾隆通志》，抵牾挂漏，较《康熙志》尤甚。此书流行，《康志》遂废，二百年间，任其阙略，并未续修。

一九一九年（民国八年）鉴于旧通志年久失修，又疏漏过甚，由任可澄（志清）、陈矩（衡山）、李国钊（祖峰）、杨恩元（覃生）、王敬彝（蔬农）、聂树楷（尊吾）诸先生倡议续修《贵州通志》。是年八月得政府允可，拨出专款，成立续修贵州通志局，以任可澄为总纂，陈矩、李国钊、杨恩元、王敬彝、聂树楷、柳元翹（小汀）、段兆鳌（甲楼）为分纂，择定车家巷（今慈善巷）资善堂左厢房三间为局址，开始工作。又邀集邹国彬（质夫）、李德晖（紫光）、文宗谿（彦生）、紫申荣（晓莲）等相助，或任编撰，或任校勘，或任采访。他们的工作，首先是商定体例。以为历年既多，资料丛集，后事叙述甚易，前事补苴为难，不得不将原志打散，另起炉灶，虽说续修，实是另纂；托始远古，自黔疆开辟之日起，下限则截至清末为止，不录生存，史例如是，修志亦当从之。惟民国后始故者，间亦酌情采入，若其人尚存，实难论定，只有俟诸后世。天文五行不过辗转钞录，兆人间丰歉吉凶之说，类多捕风捉影，并无根据，是以两门概付删除。又旧志艺文多列诗文，存玃羽而失鹏鲸，所选录者颇多芜杂，亦非可资效法，因将诗文散归各门，艺文仅列书目，间采序跋，以代提要。土官土民，旧志亦多混同，土官言统驭之事，土民具种族之别，两志亦分别言之，

其他各门，有因有创，务求原委，必列根据，以免臆说，不知者则付阙如，条贯疏理，大异以前诸志，此皆荦荦大端，其详见该局刊义例讨论书。历时数月，集思广益，反复商讨，然后定为：一、舆地志（山脉水道），二、建置志（沿革表、城池、衙署、驿传、关梁、邮局），三、前事志，四、秋祀志（大祀、中祀、群祀），五、食货志，六、职官志（官制、文职、武职），七、学校志（儒学、学额、书院、义学、学堂），八、选举志（制科、文武进士、举人），九、武备志，十、风土志（气候、方言、方物），十一、宦迹志（专纪、通纪），十二、人物志（总部、分部），十三、列女志（节烈、贞孝、贤明、才艺），十四、艺文志，十五、金石志，十六、古迹志，十七、土官志，十八、土民志（总说、苗族、卢鹿族、氏羌族、百粤族、百濮族、汉族同化者），十九、杂志（谈故、逸事、遗闻、琐述）。凡十九目。

发凡起例之后，其次为搜采资料。采分门负责、通力合作的办法。大概汉至元，重点在舆地，明清重点在人物。除钩稽旧籍外，舆地则反复讨论、探索，常亲往勘察，明其现状；人物所征辑到的故家、谱牒，志铭、传记并不太多，旧志虽可甄采，又颇多浮滥，可采者寥寥。经会议议决，发出访册，制订表格，请各县填报，该地人物之外，其他各事，皆可填入。数月之间，访册来者，箱橱皆满。

一九二〇年（民国九年）十一月因军阀内讧，演成民九之变。任可澄出任省长，志事不免牵动。当时《清史稿》尚未出书，清代人物传记颇少依据，志局公推杨覃生赴京钞录文件。时赵尔巽以遗老任清史馆馆长。他在光绪初年，曾任

石阡知府，调补贵阳知府，于贵州颇有渊源。覃生系光绪乙未进士，曾任礼部祠祭司主事，与赵相识，因得其赞助，将堆集如山的史料，任其翻阅选抄。覃生在京一年有余，抄得资料四十余册，油印后于一九二二年（民国十一年）携返贵阳，各门更得充实。时任可澄已辞去省长职务，专力修志。一九二三年（民国十二年）滇军唐继虞部二次入黔，可澄北上，局务主持无人；且储存专款，早被军队提用，经费无着，遂致停顿。

一九三一年（民国二十年）毛光翔主贵州省政，复筹专款，电邀任可澄返黔续修通志。是时李祖峰、段甲楼等皆已病故，另邀王大章（仿韩）、梁时宪（维翰）及李独清三人加入。将及两载，除前事志由任氏手纂并未停止外，复将各门削冗补残，加紧纂辑，全书渐已就绪。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（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）毛光翔、犹国才与王家烈为了争夺省政，战事迭起，城中居民，不遑寝食，有远去他省者。任可澄因战事随时皆可爆发，不能安心纂述；更恐历年同人心血毁于一旦，于是将志稿带走，避地吴门，志局虽未解散，若存若亡，虚有其名而已。

在纂修通志当中，任可澄提议印行《黔南丛书》，以免前贤著作失坠。自一九二〇年起，陆续印成两集，每集十册，由贵阳文通书局承印。第一集收入明孙应鳌《淮海易谈》、清陈法《易笺》、郑珍《仪礼私笺》，皆贵州经学有名著作。《易谈》入四库存目；《易笺》抄入正编，四库书收黔人著作，仅此一部。《私笺》受清代考证家的重视，曾编入《皇清经解》。第二集收入明徐宏祖《黔游日记》、王士性《黔志》、邢静慈《黔涂略》、清陈鼎《黔游记》、许

璜曾《滇行纪程》摘抄、田雯《黔书》、蒋攸銓《黔轺纪行集》、李宗昉《黔记》、吴振械《黔语》皆輿地纪行、风土考证之书，其中《黔书》、《续黔书》、《黔记》、《黔语》四种皆谈黔政者不可不读的要籍。各书重印时多有序跋，如陈矩的《易谈》和任可澄的《仪礼私笺》跋语，皆能阐发原书大旨，较为重要。

二

一九三五年（民国二十四年）一月，红军长征经过贵州，进驻遵义，国民党军队薛岳部跟随在红军后面，意在乘机侵夺西南诸省政权。四月以后，红军的主力西征，入云南境内，贵州基本上没有甚么战事。在蒋介石亲临策划下，以笼络收买等手段，迫使王家烈交出军政大权，任吴忠信为省主席。贵州乃由军阀统治陷入国民党政权控制之下。

一九三六年（民国二十五年）民政厅长曹经沅等提议设立贵州省文献征辑馆，八月一日成立，任可澄虽未在贵阳，仍被聘为馆长，以王蔬农为副馆长、兼专任编审，代理馆务。陈衡山、杨覃生，聂尊吾为专任编审；聂延祐（承轩）、赵恺（乃康）、乐嘉荃（采臣）、吴道安、邹质夫、马汝晔（道穆）、凌惕安、陈德谦（恒安）、严仁珊、彭述文（明之）诸人为编审兼采访；文彦生、李紫光为校勘。名誉采访则有万仿韩、柴晓莲、黄尧臣、陈菱生、廖宝铭、熊凤铎、陈凤楼、王漱荪、王楚珍、安伯英、张伯衡、刘樵松、龚雪樵、杨干之、王峻青、周监于、赵良材、唐开敬、姜鸣冈、姜辑五、徐露园、桂百铸、杨次青、向知方、李独清。依组织大纲，名誉采访无定额，由省府聘任，不支薪；正副馆长

及编审、校勘、采访也是聘任，工资称舆马费，正副馆长每月九十元，专任编审四十元，其他编审兼采访、校勘三十元，兼职不领。另外，还有文牍员、事务员（办理会计庶务之事）皆系委任，照省府规定发给。也雇用了书记多人，作缮写之事。是年十月，编审兼采访聂承轩病故，改聘喻熙箴（竹清）、李紫光为编审兼采访，李独清为校勘，李少桓为名誉采访。一九三七年（民国二十六年）七月，编审兼采访彭明之病故，同年九月八日副馆长王蔬农亦因病逝世，以专任编审杨覃生继任副馆长。由于以前所聘编审兼采访，或虽聘而未到职，或另有其他职务，或远居外县，工作进行颇感困难，在人事上作了一次调整，万仿韩、柴晓莲、李独清均改为编审兼采访。一九三九年（民国二十八年）专任编审陈衡山、编审兼采访喻竹清、校勘文彦生先后病逝，三个月不补缺额，后加聘沈渐逵为校勘。在文献馆改组为文献委员会之前，人事上已基本没有甚么变动了。

依组织大纲，文献馆的工作是：“专任本省文献之征采与编审及刊印丛书事项”。续修《贵州通志》当然属于征采及编审范围，但当时续修通志局未予恢复，亦未明确修志事宜并入文献馆，志稿不在亦无法着手。任可澄旋被任命为云贵监察使，使署设昆明，志事已不暇及。经馆务会议议决：从采访、编纂、征集三个方面开展工作。

甲、采访方面

一九三六年七月，筹备会推定吴道安、马道穆等拟定征集条例，后改名采访条例，由聂尊吾、杨覃生、彭明之修正。文献馆成立后，九月二日第六次常会修改通过，条例分：1、艺文之采访。如各县新旧志书及关于地方之著述与

谱牒，各县已出版或未出版之私人著作及译述，各县名人未有专集而散见他书的零篇断句，各县名人书画。2、人物之采访。如儒林、敦行、忠义、政绩、武功、文苑、隐逸、流寓、技艺、列女、释、道等各方面的人物，以清宣统三年为限，或民国始故者；生存者除节妇合例者外，不在采访之列。3、其他之采访。这是指民国以后的各种资料，为了继续修纂民国贵州通志而采访的事项，如民国以来行政区域的划分及其沿革，所建筑的衙署，公园、公共场所、风景地区；交通方面的陆运、公路、航空、邮传、电话、电台；教育之沿革；警政之设施及变迁，办理自治的一切经过；财政的设施及废止；司法机关的设置；官制、兵制；农工商业的兴替及物产的盛衰，矿产的兴闭、仓储之丰啬；户口增减及迁移概况；苗族等的生活状况及其变迁；道、回、释、耶稣各宗教情况；出土的金石拓片以及不属于以上的特殊事项。由馆统一制订造送册式，连同采访条例，寄发各县，请三个月内送馆一次。这是向各县作一般的采访，也收到一定的成效。特殊的事项，则派专人到该地调查访问。

乙、编纂方面

1、撰写黔贤事略，早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，续修贵州通志局尚未报请结束，正在筹备设立文献征辑馆的时候，就得到贵州省政府民政厅的来文转当时的中央电令：“案查我国文化最古，数千年来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之士，光备史乘，更仆难数。惟嘉言懿行，或因散见传志，稽考不易；或因年代久远、湮没堪虞。兹为表彰先哲，激发国民观感起见，各省应选有益于国家民族与人伦、政治、经济之历代乡贤，至多三十人，将其事略，照中学教科书体裁，择要编撰成册，

呈送核阅”，嘱志局照办。当时由王蔬农代主局事，召集会议，推定聂尊吾、陈衡山、杨覃生、王蔬农、柴晓莲、文彦生、邹质夫、万仿韩、李紫光等，分别编辑，并拟定正选乡贤三十人，备选若干人，复邀请社会人士四十余人，共同商讨选出乡贤名单。我在这个会上，对舍人、盛览列入乡贤的问题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，又拟具建议书，由柴晓莲、陈恒安附议。建议以尹珍为首，附叙舍人、盛览，以存其疑，所缺名额，以备选石赞卿补之。第二次会议，照我们的建议通过。嗣因文献馆成立后，改由杨覃生撰中卷，邹质夫、柴晓莲分撰上下两卷，于一九三六年十月撰拟完毕，送交省府核转，以后并未正式出版，亦无下文。《文献季刊》创刊时，本拟全部载入，又以缩减篇幅，临时抽出，原稿后来已被毁了。

2、编纂贵州名胜古迹概说 一九三八年（民国二十七年）京滇周览团于四月由南京起程，将遍历苏、皖、赣、湘、黔、川、桂等省，考察地方情形，计程短期内可抵黔境。京滇公路周览筹备会贵州分会函请文献馆编纂贵州名胜古迹概况，以作导游之助。馆中委托我主持其事，乃调集多人，于一个月内，择要纂辑成册。由于时间迫促，但就各种志书纂辑，内容计分：一、贵州省鸟瞰，二、建省沿革，三、各县略，四、古迹与名胜。所选名胜古迹共一百五十余条，虽多依旧说，未能亲往勘察，但相差不太大。编成后由文通书局印刷出版。

3、续印《黔南丛书》 一九三一年开局续修通志时，即将第三、四集大致编定，以缺少经费而未付印。一九三七年继续印行，内容稍有变动。第三集收入明谢三秀《雪鸿堂

诗搜逸》、吴中蕃《敝帚集》、清周起渭《桐野集》、曹石秋《烟草堂诗稿》、田榕《碧山堂诗钞》、章永康《瑟庐诗草》、丁宝桢《十五弗堂诗存》、郑淑昭《树萱背遗诗》，皆诗类。第四集收入清江闾《春芜词》、唐树义《梦砚斋词》、陈钟祥《香草词》、石赞清《恒灯吟》、章永康《海粟楼词》、莫友芝《影山词》、莫庭芝《青田山庐词》、黎兆勋《葑烟亭词》、黎应焘《琴洲词》、黎庶藩《雪鸿词》、张叔绩《枯桐阁词》、刘藻《姑听轩词》、傅衡《师古堂词》、赵懿《梦悔楼词》、邓维琪《牟珠词》、姚华《弗堂词》，皆词类。这些词集，多未刻之稿，如莫氏刻书甚多，而《影山词》独未刻。江闾《春芜词》、陈钟祥《香草词》、姚华《弗堂词》，虽有刻本，但贵州词人不多，他们都是杰出的作者。

第五集收入明高拱《靖夷纪事》、江之春《安笼纪事》、屈大均《安龙逸史》、清檀萃《黔囊》、徐家干《苗疆见闻录》、林溥《古州杂记》、杨宗瀛《都濡备乘》、罗文彬、王秉恩合著《平黔纪略》。这几部都是记贵州史事，以及杂记见闻的书，多属珍贵秘籍。如《妄笼纪事》、《安龙逸史》、皆为未刊的秘籍，记明末十八先生殉难安龙事、两书记载不同。《都濡备乘》的都濡，就是婺川，这是聂尊吾先生从他的故乡搜采得的未刊稿本，从未有人看过。《平黔纪略》虽是写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书，但所记录的事实，可以供我们参考批判。咸同之变，是贵州晚清史上一件最大的事，起义以少数民族为主，参以汉族，除贵阳外，上下游各府县均被攻破（或说安顺、黎平未攻入）。统治者调动了三省兵力，首尾二十年，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。约在一八七五

至一八七七年（光绪元年至三年）间，开局纂修《平黔纪略》，以龙阳易佩绅主持其事，高秀东为提调，延聘贵阳罗文彬、华阳王秉恩负纂修之责。年余后，易佩绅调任东道，该局无人主持，勉强支持，不过半载，因经费困难而停顿。时纂辑将成，已有十余册，乃由罗文彬、高秀东、王秉恩各就原稿钞存一部。五钞稿携出外省，罗、高两钞稿，藏之于家，秘不示人，数十年来无人得见。当修通志之初，百计觅求不获。三合胡羽高知贵阳县事，往来高宅，见架上有此书，欲借阅而高宅不允，说之再四，始允三日内阅竣归还。胡羽高得此书后，当即调集书手多人，在限期内钞完，立即送文通书局排印。高宅闻知，阻拦不及，此书遂得流传于世。但因匆促钞录印就，错讹百出，不惟字误，篇页之间亦时有漏落，甚至段落不能连接者。后凌惕安作《咸同军事史》，即改此书编年为纪事本末体，遇有不接扣者，以己意妄加增补。一九三八年（民国二十七年）间，馆内计划将此书印入丛书第五集，适杨覃生为罗宅邀请题主，见其家有此书钞稿，因借出，囑柴晓莲漏夜勘定，逐字逐句校补无讹，然后付印。此书始有可读之本。研究这一段历史，当以此本为可据。不过，此书编纂时，皆以官书奏报为依据，多有与事实不符者。我在荒市购获王个峰（名介臣、山阴人，随其父王惠来黔，在黔省各县作幕多年。）《思旧草》，是他在西路各县作幕，目睹变乱所作的诗歌，时加小注，所叙情节与《平黔纪略》多异。最甚者如清镇知县秦镇藩弃城潜出，逃回故乡，而《纪略》称其死难。王个峰亲身经历，较不实的官书，更为可信。《思旧草》已全部印入文献季刊第四期，我曾加以校勘，作跋语于后。

第六集收入明孙应鳌《督学文集》，清江闾《政在堂文集》，陈法《犹存集》》，皆文类。《孙应鳌文集》嘉靖中在陕西即已刻过，万历中，又有诗文合刻，皆无奏议。光绪中，莫祥芝刻《孙文恭公遗书》，只是诗钞及其他专著而无文集。后黎庶昌出使日本，在中村正直家得《督学文集》，即作序刻为单行本，收入《黎氏家集》中。宣统初，其后裔孙回澜，又将莫刻、黎刻合为全书，由南洋官书局以铅字印行。但国内传本甚少，所以收入五集重印，我作了一篇跋语。

别集收入清郑珍《汗简笺正》、莫友芝《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》、傅寿彤《古音类表》皆小学类。这是在通志局就刻好的，因木刻太差，拟另行刻板，未及行。但到了后来刻成这个样子也办不到了，因此定为《别集》，不列为丛书第七集。同时朱桂辛在北京将他收藏的黔人著作印为单行本若干种，也称作《别集》。《黔南丛书》全部共七十册，于一九四〇年印成。

4、编印《文献季刊》 为了保存和传布前贤遗著以及馆内同人关于黔故的记载、黔乘的探讨，将研究所得，向社会人士求正，经常务会议决，发行《文献季刊》。旋即拟定组织大纲，发出征稿启事。任可澄的发刊词说：“夫征辑焉，而囿于同人咫尺之闻见，其量数当至微；又征辑矣，徒等于古物之度阁，不公于乡人，无以得海内通人之謬正，其为益仅仅也。本刊之行，冀以蚩蚩者为椎轮，为濫觴，庶几引而益出，孽乳浸多，蔚为黔乘之光，抑进而得为浚发民族文化之一源泉焉。人靡相下之讥，士有信美之爱，是固同人豚蹄篝车之祝乎！”杨覃生的发刊词说本刊是为了“存边土